

于文斌
编著

中庸类解

國學名篇
類解叢書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于文斌
编著

中庸类解

國學名篇
類解叢書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庸类解/于文斌编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 - 7 - 5472 - 0359 - 0

I. ①中… II. ①于… III. ①儒家②中庸 - 研究 IV. ①B2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7488 号

Zhongyong Leijie

书 名 中 庸 类 解

编 著 于文斌
责任编辑 王尔立 崔博华
封面设计 韩璘工作室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6 开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4.375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472 - 0359 - 0

序 言

一、《中庸》的成书与作者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个单篇,属于“通论”类。由于其思想内容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汉代就出现了以“中庸”为书名的单行本。宋仁宗时,为激励考试及第的弟子,或赐《大学》,或赠《中庸》,或遗《儒行》,自此《中庸》的地位初显提升。迨到南宋朱熹将《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合编成“四书”,并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之后,《中庸》的地位才得到巩固和进一步提升。

《中庸》的作者为谁,一般认为是孔子之孙孔伋(子思)。《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程颐也认为《中庸》是子思所作,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朱熹也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中庸》主张性善说,这又和孟子的性善论相一致,这不仅引出了《中庸》作者的争论,还有《中庸》和《孟子》两书孰先孰后的问题。同时《中庸》中还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的话,又有点像秦王朝统一天下后的言论,也引发了学者对于该书作者和成书时间的争论。虽然存在争论,但尚没有人以充分的证据明确地证明《中庸》的作者是子思之外的什么人。

对于《中庸》的注疏与整理,自汉单行本行世之后,多有其人。而对于《中庸》贡献之大者,唯有宋之朱熹。一是朱熹将其从《礼记》中抽出后,将其列为“四书”之一,从而巩固了《中庸》的地位,提升了《中庸》的影响力,为中庸思想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二是朱熹在忠实《中庸》原著的基础上进行审慎的整理。东汉郑



玄注《中庸》，并没有分卷分章。孔颖达将其分为两卷33章，其分法并未按内容划分，反使《中庸》混乱不清。北宋二程则将《中庸》分为36章。朱熹对《中庸》整理，并没有改动原文次序，也没有像《大学》那样，既调整了顺序又作了增写。朱熹对《中庸》只是按照内容划分为33章。虽然章数和孔颖达的相同，但每章具体起止并不相同。由于朱熹是以内容划分各章，从而使《中庸》全书的脉络层次更为清楚。三是朱熹对《中庸》的注疏，不单单只作文字注释，而是广采前人研究成果，侧重阐发其义理，从而化解了《中庸》的艰涩与深奥，为《中庸》思想的普及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二、《中庸》的编写体例与结构安排

《中庸》全书3600余字，经朱熹的划分，全书共33章，是由一段一段的语录构成。《中庸》是语录体著作。但是，它又和《论语》、《孟子》不同，《中庸》是有其自己明确的写作目的和中心思想的。朱熹《中庸章句序》云：“《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这也就是说《中庸》是为“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中庸》写作目的，决定了《中庸》全书的基本思想，即为全面地阐述中庸之道以流传后世而写作此书。道学是什么？朱熹说就是尧舜作为上古圣神而临民治国的“躬行心得之余”，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儒家将其称为“十六字箴言”。《中庸》全书，就是围绕这“十六字箴言”而展开。因此，《中庸》虽然是语录体著作，但它是具有明确的写作目的和中心思想的专论，而且各章是经过精细的排列，以至前后章之间都不可易位。这一点是和《论语》、《孟子》不同的。《论语》、《孟子》虽为语录体著作，但它是积章成篇，每篇没有锁定一个固定的论述内容，同时，每一篇的篇名只取首章前两字，只起到一个代号的作用，并不能代表该篇的思想内容。

既然《中庸》是一篇专论，是围绕着“中庸”这一基本思想内容进行论说，那它必然有其论说的次序和结构形式。程颐说《中庸》的结构是：“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万事，末复合为一理。”程颐的分析是将《中庸》砍成三块，首章为“始言一理”，点明《中庸》全书的基本主旨思想，是为第一块。末章即第33章，是属于“末复合为一理”，对全书的要点加以总结而叮咛，是为第三块。去掉首末两章，其中间的

部分为第二块,属于“中散万事”,具体地论述中庸之道诸方面的内容和思想要点。

程颐对于《中庸》的结构分析,概括了《中庸》的大结构框架。但是这个结构分析只是一个大略,亦不很具体。尤其是“中散万事”的说法,常为后来读者所误读,以为“万事”有“散”于中庸,导致相当一部分人说,中庸全书各章,有一些章节不属于中庸的范围,以为中间部分是杂乱无序的一大堆语录的堆积,更使人如堕五里雾中而不得其解。这种错误的解读的出现,完全是由于程氏的分析过于粗略所致。

其实《中庸》的中间部分(002-032章),也是有很清晰的结构安排的。依据朱熹等前人的研究结果,这中间部分是按纵向深入的顺序排列,共有三个层次。这就是学者们说的“中庸三支”。王夫之说:“《中庸》三支,皆始乎道而极乎德。”所谓“三支”的第一支,是指第2章到第11章诸章,朱熹认为这一部分是“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义止此”,本书将其名之曰“明道篇”。第二支是指第12章到第20章诸章,朱熹认为,“此引孔子之言,以继大舜、文、武、周公之绪,明其所传之一致,举而措之,亦犹是耳。”“举而措之”,就是论述怎样付诸实践,因此,本书这一部分名之为“行道篇”。第三支是指第21到32章诸章,朱熹在21章后评论说:“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各章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以下十二章的说法,显然不包括末章,因为程子说过“末复合为一理”,朱熹是明确知道的,并且将其附加在《中庸》的文首。这一部分核心是论述“诚”,诚是成道的关键。唯有至诚才能成己成物,臻于至成,故本书将这一部分名为“成道篇”。且“成”字通“诚”。成道篇之“成”,即有“完成、成功”之蕴,又有“真诚真实”之含。“中庸三支”的说法,也不是什么新成果,不过是一种新说法而已。其实在朱熹对《中庸》的注疏中已经说的很清楚,已经含有这个内容,只是没有这么说而已。但是“中庸三支”的新鲜说法,对于读者清楚把握《中庸》的脉络结构,还是很有好处的,因为它把“中散万事”部分的结构说的更清楚明了。根据“中庸三支”说,本书将《中庸》全书分成五个部分,首末两章,各为一篇。中间部分以“三支”为据,分成三篇。这样全书共有五篇。经这样的划分,读者阅读《中庸》一书,可以获得更加清晰的印象,不致于出现孤立地看待各章、而使阅读不得其要领的问题。

笔者近十年来撰写了《论语类解》、《孟子类解》、《大学类解》和《中庸类解》。



四本书虽皆称“类解”，但其分类方法不同。《论语》和《孟子》原书是积章成篇，篇中各章并无逻辑联系，因此，这两本书的“类”，是按每段语录的思想内容归类而进行解说的。《中庸》、《大学》两书，由于是“专论”，且其内部有严格的逻辑次序，因此，这两本书的“类解”，是按照原书的“结构”进行“类解”，原书各段语录编排顺序不变，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再“清晰”的工作。将《中庸》全书按其结构依次分成五篇，即宗旨篇、明道篇、行道篇、成道篇和叮咛篇。各篇的篇名也是反复斟酌、名之有据的，在体现该篇内容的同时，又能彰显《中庸》一书纵向深入、顶真续麻的逻辑结构特点。经过这样的划分和编排，或许更适合于读者阅读和教师讲授，对初学之士则“庶乎升高行远之一助云尔”。采用“类解”的方式解释编排“四书”，这在儒家经典注疏史上，或许是首作，权作尝试，高下优劣，谨待读者评判。

三、《中庸》的思想内容和终极追求

朱熹《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写作的目的决定了《中庸》一书的性质：《中庸》是明道之书。它是哲学，是价值观和方法论，具体说，它是中国的哲学，中国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哲学是具体的抽象。因此，中庸作为哲学，它的涵盖是广泛的，普遍的，既广大又精微。“君子之道费且隐”，但“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一方面是中庸之道是浅近的，它源于生活，“造端乎夫妇”，故“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但理解和把握中庸并进入至高境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圣人且有所不知，有所不能，那么何以进入中庸的至高境界呢？《中庸》告诉我们，“及其至也，要察乎天地”。由此我们可知，中庸之道源于天，而本于人，既有天道之所依，又有人道之所据。“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之道是天道和人道的融合与统一。因此，上古圣神，察乎天地，观乎人性，发明求“中”之至得，囑告后来人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因此，《中庸》一书的结构和内容，都是围绕这“十六字箴言”而设置，它是我们理解《中庸》一书的钥匙。

中庸之道是天命率性之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是《中庸》开篇

所对中庸的解释。儒家学说认为,天地化生物,人是万物之一物。天在化生万物之时,既赋之以性,亦赋之以理。因此,人和万物一样,各循其性之自然,由此,必然会产生所当行之路,这就是“道”,这就是“中庸之道”。由此我们可知:天命、性、理、道以及教诸方面是一致的,但是事情并非这样简单。一是物之性是绝对本能与自然,而人之性,既有生理上本能的自然之性,但儒家学说认为,这不是人的本性,因为没有体现出人与动物的区别。《中庸》和《孟子》认为,善是人的本性。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朱熹说:“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是为性也。”《中庸》认为天命之性,就是人的善性。这种仁义礼智的善性是天赋于人的,人人同有,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因此,中庸所主张循性之自然而为,就是循人本身所固有仁义礼智之性而为,这才是中庸之道的真正内涵。性道虽同,但气禀或异,因此人的心虽是一个,但有“人心”和“道心”之异,这是因为“或生于形气之私,或源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不同”。道心反映着仁义礼智的人的本善之性,而“人心”则反映着人的耳目口鼻等自然本能之欲,二者经常杂于方寸之间。中庸之道就是要求人要“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精一纯诚地守其本善心,做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这样才能“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道本原于天,而实体备于己。中庸之道是率性之道。能否率性,关键在于诚。“唯天下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因此,率性之道,也是至诚之道。唯至诚方能率性。人能诚一守其本善之性而为,则中庸之行庶乎不差矣。

中庸之道是持中守正之道。“中”和“正”,是中庸之道的核心观点,是中庸之道继续向深广方面推演的重要标准和理论基石,它体现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孔门传授的“心法”。中庸之所以强调“中”,是源于尧舜临民施政的躬行心得之余。并且是因为尧的“允执厥中”之一言,而舜又复益之以三言,在前面又加上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尤其是“惟精惟一”一句,加在“允执厥中”之前而加以强调,可以看出上古圣人对于“中”的深切感受。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程颐说:“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所以强调“中”,是源于对于人的性情的分析。朱熹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



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所共由，道之用也。”人的本善之性，源于天之所赋。其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性居主导，而无偏倚，是一种居“中”状态。作为性的附属物——“情”，发时必会有中节和不中节之异。发皆“中节”为好。如其不能“中节”，则必生偏倚而失中。中与正是紧密联系的。得中则正，失中则失正。因此，人能以性制情，以理制情，就能确保行为的中正不偏。中，体现着古人的辩证法意识。它所强调的是合宜适度，防止极端和片面。从横向看，中庸讲不偏不倚；从纵向看，中庸讲无过无不及。具体地说，中庸是劝告人们，为人处事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要适度，要恰到好处。中庸不是两个端点之间的平分点，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最合情合理的行为选择，这就是“权”，它的难点在于体现“恰到好处”。能否做到“恰到好处”，主要取决于行为人的学习与修养水平，取决于行为人对事理的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曾对中庸的研究给予关注，他说：“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毛泽东书信选集》）能否中正，核心在“度”。得度则得中，得中则得正。依中庸的理论推导，这个“度”的把握，源于人的仁义礼智之性，而性又来源于天。中庸的“度”的标准，就是天道。以“中正”的角度去考虑怎样做人、做官、做事，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没有价值的，都会一清二楚，如此则人必有至善之美。这就是中庸所提供的方法。

中庸之道是求善止善之道。中庸之道以“中”为核心观点，并以此为价值尺度和价值方法，向广泛的领域去推导，结果发现，中者必正，中者必善，中者必美。何谓善？正确的谓善，良好的谓善，高尚的谓善。善与不善，即对与不对、好与不好，反映着人们在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是天道人性的自然流动。因此说，善，体现了天命率性之意，体现了“中”，同时，它又是平常日用当行之理而不可改变，它又体现了“庸”。中庸以天命率性推演出“中”，又以此推演出“正”，以“中”又推演出“善”。“善”是附庸于中庸之道的又一个重要观点，它同样反映着人们对事物评价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方法。怎样求善而至美呢？君子之事，不过于修己治人。中庸认为“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要求人必从身边小事做起，积小善为大善，最终达到君子自觉且能自然地践行中庸之道而达于美善。中庸给人们规划了致善的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就是：齐家(015章)→致诚(016章)→尽孝(017章)→立仁(018章)→守礼(019章)→行文武之政(020章)，这个

路线图是纵向的,也是横向的。说这个路线图是纵向的,是因为它体现了由低至高的次序,说它是横向的,它分项横列了修为中庸之道而致善的具体内容。有人认为《中庸》的第15章到20章所论已不是中庸的内容。其实这是不通《中庸》者的胡言乱语。第15章论齐家,君子能使“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天道人性的自然期待。第16章论“诚”,诚者,天道。诚之者,人道。不诚无物。中庸之行,唯在其诚。诚乃与天道一。第17章论“孝”,孝乃天理人性的自然要求。孔子说:“为人子,止于孝。”孝是天命之率性之道中应有之义。第18章论“仁”,天地之大德曰生。仁是天德。孔子说:“仁者,人也。”仁也是人性的自然要求。仁上达天德,下合人道,本在中庸之中。第19章论“礼”,中庸讲求“恰如其分”,讲求“尺度”。没有尺度就没有中庸。“礼”是尺度的具体外现。践行中庸之道的尺度把握,唯有以礼为标准。第20章论“文武之政”,文武之政,以仁为核心,较之夏商周三代,唯文武之政,合天道人心,是为“善政”。推崇文武之政,是中庸理论推导的结果,是中庸理论的必然要求。中庸之道,就是求善之道。即通过中庸的价值尺度和方法,寻求最为正确的、合宜的、良好的、高尚的。中庸还要求“止于至善”,即必至于善而不迁,要做到诚心而“择善固守”。求善是中庸的出发点,止于至善是中庸的目的。

中庸之道是素位守常之道。中庸之道费而隐,既有高深的一面,也有浅近的一面。说其浅近,因为它“造端于夫妇居室之间”,所倡不过是平常日用所当行之理。因此,从中庸的概念的表述上,也体现着这个观点。我们知道,所谓“中庸”者,一方面是“中”,一方面是“庸”。何谓“庸”?朱熹说:“庸者,平常也。”程颐说:“不易之谓庸。”朱、程解释虽有不同,只是角度问题,实质是一样的。平常的、常规的道理,往往也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大学》云:“为人子,止于孝。”孝是平常的道理,同时也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孔子时代倡导“孝”,至今两千余年而未能改变,从现在起再至两千年后,有谁能肯定地说“为人子,不止于孝”呢?中庸之道的“中”和“庸”两者的联系也是紧密的。平常之理,也是自然之理,体现着人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然生发,是天道人性的自然和自觉。中者,以天道人性为其定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者,庸也;庸者,中也。没有庸而不中者,没有中而不庸者。朱熹说:“中庸只是一个道理,以其有不偏不倚,故谓之中,以其不差异可常行,故谓之庸。”(《朱子语类》)中庸之道,就是平常之道。平常之道也是正道,它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的本善之性和道德内涵,任何人都不能小看这平常之道。老子也非常



看重日用平常之道,他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道德经·十六章》)中庸之道,作为素位守常之道,就《中庸》一书所阐述的内容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道不远人”,“常”是入道之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只要认真体会生活,其道可知可悟,方法就是“致曲”,从小的善端做起,进而向全面发展。朱熹说:“圣人能举其性之全体而尽之”,而普通人“则必自其善端之偏而悉推致之,以造其极也。”因此,《中庸》所设计的修养路线图,也是本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的观点,主张从日常的家庭管理起步。知常守常,实是入德之门也。其二是“衣锦尚絅,暗然而彰”。中庸主张取常而任自然,反对华而不实,反对炫耀和张扬。“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应当是“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文质相宜,文质彬彬。对“素隐行怪”的作法,中庸认为是有悖于“常”,是“内不实而外沽名”,是“私欲所趋而悖天理之公”。因此,君子终生应当“居易以俟命”,决不可“行险以徼幸”。其三是“素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位而行,就是思不出位,“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认识现实环境,把握现实位置,不嫉妒,不红眼,不急成,随遇而安,淡然对待生活的一切,始终保持一种“无入而不自得”的快乐心态,对于生活中的尊卑穷达,不必怨天尤人,依乎中庸之道,以良风懿德修养好自己,以义安命,遁世不见而不悔,“贱而好自用,卑而好自专”,自以聪明,实是越位而强出头的表现,是对中庸之道的背离,会“灾及其身者也”。

中庸之道是成己成物之道。首先,中庸是明诚之道。心之官则思,每人的“心”虽有一个,但由于气禀不同,故有“人心”和“道心”之异。修炼君子向道之心,必使“道心”常为“人心”之主,这就是“诚”。“虞廷十六字”言“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精一致诚,是贯彻中庸之道的根本和关键。“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由诚而明,是性之也,是圣人的致诚之道。由明而诚,是返之尔,是普通人的致诚之道,斯诚之成,唯待后天之教。其次,中庸是成己之道。君子“澡身浴德,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儒行》语),成己然后成人,成人然后成物,成己是成人成物的开始。君子修成至善美德,要“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君子修明而致诚,致诚而入道,从而实现人心与道心的高度同一。“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君子以诚为贵。君子成己之道,唯有从“诚”开始。成己是成人成物的条件。因此《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

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第三,中庸之道是成人成物之道。《中庸》言:“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为内,成人成物为外。君子修至明之德,并非要孤芳自赏而炫于外。君子之道,莫过于与人为善。君子成己的同时,还要成人,肩负起先觉之责,即孟子说的,中要养不中,才要教不才,使贤愚不肖一同致善。成人,就是行人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君子能成人,亦能成物,因为人是物之一种。能成物,则“可以赞天地化育”。赞天地化育,就是达到了首章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天地之得其位,则人得其位,如此则与“天地参矣”,中庸之道得矣。君子成己、成人、成物,一赖于“诚”。诚者,天道;诚之者,人之道。诚是对天道人性的打开和沟通,诚能尽天命之性,诚能率性以为道。没有诚,就没有中庸之道。君子不能致诚,成己、成人、成物之功不可及也。

中庸之道,就是孔子之道。首先,孔子是中庸思想的发明人。毛主席曾说,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但在孔子之前,圣人已萌“用中”思想。这一点在朱熹《中庸章句序》中说的很清楚:“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孔子对于中庸的贡献,就在于孔子能在其前广博而芜杂的文化荒野中发现了中庸这株优雅而芳香的幽谷之兰而撷取之,这是孔子的“发”。栽植下去,成为人的向往和喜好,这是孔子的“明”。既发且明,使原来很普通的思想观点而成为熠熠闪光的、弥足珍贵的方法论和哲学观。其次,孔子的思想是中庸的最高成果。朱熹评论孔子说:“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章太炎说:“儒道两家是以哲理为基本而推衍到政治和道德的。”儒家的哲理就是中庸。中庸作为一种哲学的方法论,它的终极追求是大中至正,至善至美。用中庸的观点推导孔子的思想,荀子和子思都认为,孔子思想集中地体现了中与正,善与美。荀子说:“夫道也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孔子仁知且不蔽,一家得周道。”结合本书而言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思想得人道之美善。“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孔子思想与天地之道准。因此,孔子思想有“小德川流”之效,又有“大德敦化”之功,以中庸观点看孔子的全部思想,



孔子思想集中地体现了“中”、“正”、“常”、“善”的标准,孔子思想是中庸思想方法运用的结果,是中庸思想的极致。

总之,践行中庸必宗循孔子思想。这是作者子思的目的所在。孔子的思想产生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争鸣的时代,也是最容易产生疑惑的时代。“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惑是惑非,惑治惑乱”,孔子思想尚未从百家中脱颖而出而成为显学,因此,世人确实需要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个智慧的头脑,否则必鱼目混珠而是非善恶莫辨矣。荀子说:“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子思之意与荀子相同,都是要在百家争鸣之中,旗帜鲜明地捍卫和弘扬孔子思想,借以达到一固孔子文化中心地位和圣人地位。孟子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中庸》的目的是“择善而固执之”。孔子之道善,故在当“择”而“固执”之内。学孔子之道,养中庸之品,做人有君子之德,做官有君子之政,得“内圣外王”之贤,进而达“和平之盛”,这就是中庸的终极追求。

四、中庸的思维方法与实施原则

中庸是哲学,是中国人的哲学。中庸是价值观和方法论,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中庸》是明道之书。一部《中庸》反反复复教诲于人的,君子生于世,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怎样做才是高尚的,有意义的。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君子怎样做才是“真善美”。《中庸》告诉人们,实现君子行为的真善美,唯有中道而行。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中道,是事理之当然。因此,中道就是求正确之道的道。《中庸》反复教导人应当求“中”,其目的就是告诉人们寻求“正确”。因此,我们学习《中庸》,不仅要了解中庸的内容,要了解中庸的方法和原则,这是我们学习《中庸》的根本目的所在。对于中庸的方法和原则,在前文介绍中庸的内容时,已略有涉及,但为了初学者能更清晰地了解中庸,这里再做一点归纳,只作扼要介绍,不作展开论说。

致诚率性法。中庸的立论基础是性善论。中庸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善的,即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人的

这种本善之性，是上天赋予的。因此，天命、天道、天理和人性，是同源而异名，实质是一致的。中庸之道的极致是天道。人的本善之性，是上天所赋，本是天道的自然反映。因此，求中之道，不必远求，《中庸》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又说：“君子之道，本诸身。”本诸身，就是真诚地从我所天赋固有的本善之性出发，即从我的“良知、良心”出发，则中道得矣。所谓“率性之谓道”者，核心是一个诚字。诚者，天道；诚之者，人道。“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率性由诚，诚能率性。率性虽为中庸之道，“诚”必须参与其间。

推己及人法。这个方法在《大学》里被称为“挈矩之道”，现代人称之为换位思考法。《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中庸》第13章对此法作了例举性的说明。“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为政也是这样，要“征诸庶民”。通过换位性的思考，则成人成物，中庸正道得矣。换位思考之所以能求得中庸之道，是基于人与人本是同类，同类必有共性。荀子说圣人所以圣者，“以己度者也”，讲的也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换位思考，成就了圣人之“圣”。

执两用中法。《论语·子罕篇》云：“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两端者，事物的始末、上下、正反，两端既明，则事物之至中之理亦明，原本“空空如也”，经过“叩其两端”，而竭尽其中正之理。《中庸》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所为舜乎！”隐恶扬善，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于精华的部分，还要控制其“两端”，防止偏颇，选取它的“中”用于施政理民。朱熹说：“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中庸》言：“极高明而道中庸。”舜所以是“大智”者，就是在于他“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娴熟地运用中庸的思维方法。

素位守常法。庸者，平常也。中庸之道是平常之道。中庸认为“常规、常道、常理、常德”，都是天命之善性所自然形成的，体现了“中道”。所以求中庸不必舍近求远，执柯伐柯，其则不远。君子能尊重“庸德”，坚守“庸德之行”，则中庸之道近矣。坚持“庸德之行”，就是要“居易以俟命”，不可以“素隐行怪”，“行险以徼幸”。坚持“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找准自己定位，面对差距，淡然以对。“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都是不守本分，是对中庸的背离。

自省慎独法。坏事都是在人所不见处发生的。因此，中庸认为“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君子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内省不



疚”，必须“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坚持“慎独”。这是因为心之官有“人心”和“道心”之异。“慎独”，就是反省自己，在人所不见处用功夫修养好自己。道心成一身之主，则天命之善性之发扬，其所行必得中道而合德焉。

综合比较法。这一方法主要蕴含在《中庸》的第20章、27章和29章。善是中庸的外现。追求至善是中庸的目的。善是比较而来，而制度最能体现善与不善。孔子考察了夏商周三代之“礼”，唯有周礼“郁郁乎文哉”，而今尚在“用之”，体现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因此，哀公问政，孔子力荐“文武之政”，认为“文武之政”合中庸之道，是三代之善政。在第20章里，孔子提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标准。第27章中提出了“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的要求。第29章，对君子王天下之求至善至美的方法，说的更为明确具体：“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这六条标准，“本诸身”是出发点，“征诸庶民”是落脚点，“考诸三王”是讲于史有据，“建诸天地”是讲不违天地人之道，“质诸鬼神”是指有卦卜之验，“百世以俟”是指向后三千年去看，其善有久。这六条标准，除“质诸鬼神”一条外，其余五条都是谋求“至善”的重要方法和标准。

道德定位法。中庸追求中正是以天道为根本定位。合天道者是中庸，反之，则不是中庸。天命之谓性，天道又和人性相联系。天道之所以和人性相连相通，这是因为人性来源于天，是天之所赋。而正确的道德又是天赋本善之性的直接反映，它体现了“中”，也体现“正”。因此，《中庸》认为，寻求致中达正有更为直接的方法，这是守道遵德。“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五达道与三达德，是天道人性的直接反映和自然要求，体现了“中”和“正”。因此，致力于中庸之修者，倘能守其五达道三达德，实际就是遵守了中庸之道。《中庸》所论述的道德直接定法，在《论语》、《孟子》中也有相类似的阐述。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篇》）。孔子认为把握准中庸之道，其核心在于能以“义”为尺度。义者，宜也。合道者为宜，合德者为宜，合法者为宜。把握了“义”，也就是把握了中庸之道。孟子说：君子坚守中庸应当“居天下之广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孟子·滕文公下》），“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仁义礼三者，是广居，是大道，是正位，是正路，得中得

正,坚守仁义礼,也就是坚守了中庸之道。孟子还有更为直截了当的话:奉守中庸之道,就是“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为与不为、欲与不欲的是非标准是“义”,把握了“义”就是把握中庸之道。

以上所谈诸法,是就中庸思维方法之大者而言。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孔子家语》)这些思维方法的最终归宿,就是“中正”二字,也就是说中庸教人通过一种正确的思维方法,从而获得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不对的;怎样做是有价值的,怎样是没有价值的;怎样做是高尚的;怎样做是不高尚的。人们通过对这种“心法”的把握,从而实现致道升德、臻于至善的目的。中庸不仅提出思维的方法,还提出了一些原则。就主要而言有如下:

中的原则。中庸之道反对走极端,认为“中”是事物的最佳之点。因此,中庸反复告诫于人的是“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求中以致正。无偏倚,是就空间位置角度讲;无过不及,是就时间和事物发展程度的角度去讲,两者是相通的,只是定义的角度不同而已。合于“中正”,则是中庸,则是君子之道;反之,则非君子之道。

诚的原则。中庸之道是率性之道。能否率本善之性以为道,核心在诚。诚是关键。“十六字箴言”特别强调“诚”,认为践行中庸君子之道,贵在“惟精惟一”。诚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人心有二重性,有“人心”和“道心”之异。唯诚能上通天心,下合人性,以“道心”制“人心”,保持人的本善之性。

仁的原则。中庸之道的思想核心是“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仁上通天道,下接地道,中合人道,仁道体现了天命率性之要求,因此说,仁道体现了中庸之道,是中庸之道的根本标准。没有了仁就没有了中庸。中庸言“忠恕违道不远”,道理就在这里。

权的原则。“权”是孟子提出的观点。权,就是权衡。中庸讲“中”,但“中”决不是两者之间的平分点。中无定位,因时因事而异。孟子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权的观点,是提示人们在奉行中庸之道时,对于“中”的定位,不可僵化机械,要有适度的灵活性。孟子的看法是:“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和的原则。朱熹说:“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建设和平、和睦、和谐的社会,是中庸的终极追求。因此说,中庸之道,也是和平之道,和谐之道,和睦之道。



中庸是追求“和”的。《论语》有子云：“礼之用，和为贵”。礼本身是制度，也有一定的强制性。因此，贯彻执行礼，尽量用“和谐”的方法去实施。和也不是无原则的。因此，中庸还主张“和而不同”，“和而不流”，主张效天德而至广至大。但有子还有补充说明，提出两条原则：一是这种调协的做法大事小事都可用，但有的事情就不能这样做。二是不能为“和”而和，使“和”做得过分，显得孱弱无力，要用“礼”去约束“和”，使“和”做得无过不及，符合中庸之道。

中庸的方法与原则，最终目的是指导人们如何履中行正而致善升德的，它属于技术层面。履中行正而致善升德，还需要有动力的推动。这个动力是什么呢？儒家的学说告诉我们，这就是人的良心、良知与良能，即人的天赋本善之性。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朱熹也说：“天降生民，则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仁义礼智，上天所赋，人所共有，尧舜与我同焉。但人的气质或有不齐，故有高下不等之差，但“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使之治而教之，以可复性”，“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朱熹语）如此，人能积极地修为，人皆可为尧舜。“教”是原动力得以启动的关键枢纽，而“学”是原动力得以运动的加速器。这是孔子中庸学说和西方道德学说的重要区别。西方的道德学说依附宗教而不能独立。例如，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实践理性批判》中认为，上帝是人们践行道德的保证，如果没有上帝，则人的道德观念就失去约束力。以上帝为约束力，还有赖于人对于上帝的虔诚度，虔诚度下降，则必然会降低对于道德的遵守。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学说不需要上帝或一种至高无上的神的支持与保证。向善之心，人所共有。良心、良知、良能作为原始的动力机，只要这个动力机不停止转动，就可以促进人们走向道德的彼岸，人皆可以为圣贤。这个动力来自人的本身，不是外在精神力量的消极督促。因此，孔子的学说是积极的，它总能带给人向上而有所成就的曙光。将孔子的学说扩大到学校教育、企业管理和社会治理各个领域，总是能发挥着振奋和激励的作用，促进人的自强不息和积极修为。因此，学习中庸的方法，践行中庸的原则，应当终生地保护好自己内心的原始动力机——良心；离开了这个动力机的推动，一切都无从谈起。

五、《中庸》的解说与学习

《中庸》是哲学，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且以语录体的形式写成，故其在理解上